

意识形态操纵视域下 苏联解体的历史缘由与深刻教训

吴学磊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手段对内进行思想控制、对外进行政权颠覆, 是其巩固统治的惯用策略。上世纪, 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操纵理论的成熟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操纵, 通过反共势力的培养、话语体系的替换、错误信息的输入、精英阶层的蛊惑, 不断分化苏联社会价值观, 制造和加剧了苏联民众的信仰迷茫。同时, 利用苏联内部“第二操纵者”构建错误理论、壮大反动组织和大搞历史虚无, 进一步解构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 加速了苏联解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保障国家政权安全的关键一环, 一定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加强宣传舆论阵地建设, 坚定全党的信仰信念信心, 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思政育人格局。

关键词: 苏联解体; 意识形态操纵; 原因; 教训

中图分类号: D73/77;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3-0034-09

收稿日期: 2024-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KS038); 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 吴学磊(1993-), 男, 山东临沂人,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3.004

苏联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强大的“世界一极”迅速走向灭亡, 其中原因众说纷纭。学界既有将之归咎为政治体制僵化, 也有认为是经济模式积弊太久, 不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失误却是公认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言: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 在苏联后期, 苏共领导层为什么会急切地认同、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 从上而下地推行质疑、反对、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并积极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 最终坦然接受国家的解体? 西方对苏联社会所实施的意识形态操纵无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意识形态操纵就是“通过为人的行为编制程序来对人施加精神影响”^②, 实现“我们不强迫你去做, 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 进入你的意识, 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③ 正是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社会的长期操纵, 才使苏联领导层甘愿让历史向西方所期望“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给苏联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今天,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④, 与西方在发展上的和平竞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输入的意识形态风险, 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未曾改变,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依然遭受来自西方的威胁。

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意识形态操纵的策略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乔治·凯南和杜勒斯兄弟就提出了诸多瓦解苏联的意识形态方案, 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认可。二战以后, 在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迅猛发展的现实背景下, 凭借“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进行政权颠覆, 就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 他们据此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意识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170 页。

②③[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 徐昌翰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第 39 页, 第 52 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66 页。

形态操纵的策略。西方的操纵者联合苏联内部的反对势力,利用编制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渲染美西方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的优越性,通过制造种种抹黑苏联的历史谣言,持久地对苏联社会心理施加影响,进而改变了社会成员的意见、愿望和目的,尤其是对苏联上层社会的蛊惑,不仅对其实现了精神上的控制,使其逐渐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也使其行为活动向颠覆苏共政权的方向发展。

(一) 扶植苏联内部反苏反共的“自由战士”

意识形态操纵的主体,是达成意识形态操纵目的的核心。西方在对苏进行意识形态操纵的过程中,重视扶植苏联内部反苏反共的力量,他们通过以谎言、欺骗、谩骂为基调的蛊惑性宣传,向苏联社会大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达到了动摇苏联民众社会主义信仰的目的。西方对苏联内部反苏反共势力的扶植,主要分为“持不同意见者”和非政府组织两类。

1. 西方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声援与支持苏联境内反苏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苏联历史上的极端政策和现实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致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与官方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相左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有推崇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苏共内部的自由派等。他们尽管在具体主张上存在差异,却普遍推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这就让西方看到了“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①的可能,为西方从内部瓦解苏联提供了条件。西方的具体支持方式,有授奖、声援、出版著作、宣传学术观点、领导人接见、资金支持、人身保护等。苏联的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安·萨哈罗夫作为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就受到了西方的特别关照,先后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与国际人道主义奖,以增强其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力。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接见了苏联反对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并公开致信萨哈罗夫表示对国外人权事业的支持,以此来为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劲。里根上台后,继续推进并加强“人权外交”,并在1988年访苏期间公开接见“持不同政见者”,其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更是“鼓舞了全苏的改革者”^②。

2. 西方借助本国的“民间组织”,在苏联境内广泛扶植反苏反共的非政府组织。“赫尔辛基协定”签署以后,“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建立“人权委员会”、“苏联保卫人权自发组织”、“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等非政府组织,标志着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分散的反抗过渡到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反抗的开始。”^③西方注意到了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强大组织性和破坏性,以及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推广西方生活方式、掩护苏联反对派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操纵方面的巨大潜力。美国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民主中心”、“索罗斯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在苏联内部扶植和资助亲美、亲西势力,对所谓的民主机构给予资金上的援助、技术上的帮扶、政治上的支持,以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桑德斯曾揭露:“中央情报局竭力……把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非正式的联合力量。依靠这些‘朋友’在国内外为美国政府的利益讲话。”^④在西方国家的长期扶植下,苏联内部出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据1989年2月《真理报》的报道,苏联内部已有6万多个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肆无忌惮地宣传、美化资本主义,散布苏共“罪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思想,借机煽动群众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各种反共反苏活动,加重了苏联社会的动荡。

(二) 利用“普世价值”话语编织意识形态幻象

人类的交往离不开话语这一中介,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表现为话语关系。任何话语的形成都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文化积淀、社会思想、风俗习惯、时代境遇紧密相关。话语体系作为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理论知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不同文明之间

^①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

^③ 转引自: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④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42页。

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①,话语能够支配主体的思维方式、言语表达、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借鉴,对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繁荣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话语体系的核心与本质是思想理论体系,对一套话语体系的接受,也必然是对其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价值理念产生认同,且话语符号的概念意义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认知差异,具有特定内涵且与民众固有认知相异的外来符号系统可被用作颠覆政权的工具。所以,外部话语体系以意识形态操纵为目的的输入,会在改变被操纵国家话语表达的同时,影响被操纵群体的思维方式,进而动摇其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念。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彰显着无与伦比的科学性。苏联以此为指导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该具有先进性,使其能够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掌握话语优势。然而,西方国家通过“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抽象价值观念所塑造的话语体系,在解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划分逻辑中,构筑起“民主社会”与“极权社会”的划分标准,以象征性的抽象概念营造出西方制度无比优越的意识形态幻象。西方还通过概念、范畴、口号等语言符号,将被操纵者思维惯性化,在他们的意识中勾勒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且与原有认知相悖的整体意象;通过蕴含价值观念的语言符号感召目标群体,使之对该意识形态产生共通感和共鸣感,增强其情感认同;通过操纵目标群体的整体认知,激发其情感体验上的共鸣,促使被操纵者对隐藏在话语符号体系背后的意义系统自觉追求,实现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主动信仰,巧妙发挥了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苏共领导层对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的虚假性缺乏理性认识,被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功操纵。戈尔巴乔夫曾言:“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②苏共领导层将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创新,错误地等同于对西方话语、西方价值的迎合与嫁接,自身甘愿成为西方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急先锋、马前卒,沦为了颠覆苏联政权的“助推器”。

(三) 借助“自由”的信息流来瓦解人心

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社会意识受到信息流所营造出的信息场的直接影响。媒体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报道必然不是完全客观的,“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③。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之所以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更加自由地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操纵渠道的功能。上世纪,蕴含着意识形态要素的信息流,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交锋的利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传媒技术上的优势,对苏联大打“宣传战”、“思想战”和“攻心战”,以瓦解苏联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心。西方通过持续性地捏造事实、造谣蛊惑和选择性报道,诋毁了社会主义声誉、败坏了苏共形象;通过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实现了对苏联社会民众的思想拉拢。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如果我只能选择一条对外政策原则,而不能选择其他的话,我会宣布这条原则就是自由的信息潮。”^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层深知,与利用军事手段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相比,大众传媒起到同等效果的花费要小得多得多。因此,西方国家将大众传媒视为反苏反共的主要宣传战工具,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建设工作,先后建成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德意志电波电台”等无线电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向苏联宣传有关“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人权”等西方概念,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和生活,持续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并传播一些所谓国际和苏联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消息,以捏造事实、捕风捉影的方式,煽动、教唆和挑拨苏联内部的民族对立情绪及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使苏联民众产生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往,促使苏联自觉向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9页。

②[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8页。

④[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西方道路靠拢。里根赞扬“美国之音”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①。尼克松则强调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使苏联无法完全由它来对东欧及本国进行思想灌输”^②。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西方利用无线电广播等大众传媒，逐步实现了瓦解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信仰的目的，培植起一大批对西方社会、制度、文化向往的个人及团体。可见，西方主导下的大众传媒，在削弱苏联国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苏联民众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凭借广泛的人员交流实现“以接触促演变”

二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同西方国家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增多。1956年，艾森豪威尔提出同苏联展开大规模的“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构想，企图在人员交流接触的过程中进行意识形态操纵，这也被西方领导层认为是“播撒自由的种子”的最便捷方式之一。赫鲁晓夫掌权以后，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了改变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和负面形象，将“三和路线”作为与西方交往的指导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近乎“不设防”的局面。1958年，美、苏签订《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的交流协议》，为美国利用人员往来进行意识形态操纵提供了重要契机。美国为了增加“人民之间的接触”，制定规模巨大的人员交往投资计划，以扩大美苏之间的贸易来往、旅游人数以及高校人员的交流学习等。在美国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操纵下，美苏社会之间、人民之间、思想之间、商业之间的接触最终会“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③。

西方特别注重将苏联社会的年轻官员、干部子女、杰出学生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等人群作为意识形态操纵的突破口。西方认为苏联青年一代的思想更加活跃、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具有被操纵的先天优势，而且他们必将在未来掌握国家的权力，主导苏联社会的走向，实现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操纵对颠覆苏联政权极为重要。艾伦·杜勒斯就曾表示，对待苏联“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④。因此，西方国家积极开展行动，美国注重对苏联青年知识分子的“熏陶”，大力赞助苏联大学建立美国研究所，并积极输送大量宣传西方文化的图书资料；选派政府官员、学者及各界代表性人物赴苏讲演，宣传美国情况、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西方专家、学者到苏联讲学，吸引苏联学生、学者到西方学习；以“国际访问者计划”为支撑，邀请苏联重要职能部门的当权者和后备年轻人赴美留学，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反共宣传，努力培育“亲西方的下一代”，以期影响苏联未来党政部门、宣传、文教、经济等领域的政策。苏联的许多杰出青年，在美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其思想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苏联国内形成了一大批认同和拥护资本主义的亲美亲西方的精英群体，他们在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第二操纵者”在苏联内部的意识形态操纵活动

西方把苏联国内的社会精英作为意识形态操纵的重点人群，使这些精英群体变成反体制、更迭政体的合作伙伴后，自觉充当践行外部操纵者意志的“第二操纵者”，他们影响与操纵苏联内部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的思想认识，为推翻苏共政权奠定了内部基础。德米特里·亚佐夫被《独立报》记者问及苏联解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时表示：“这里还是那些主观因素起作用。苏联境内外的敌人有意用尽浑身解数促使苏联灭亡。”^⑤ 戈尔巴乔夫的利益集团无疑是最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第二操纵者”，他本人就一直坚信“我们的未

①②刘洪潮 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第207页。

③辛灿：《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④[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⑤李慎明、张树华 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栗瑞雪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① 撒切尔夫人也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② 来自苏联高层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导致了思想领域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是在带有浓厚西方价值色彩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不仅颠覆了苏联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加速了苏联向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生演变。1987年11月，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鼓吹超越阶级的、具有强烈普世价值色彩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③的理论，特别强调要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化”，并以这种“新思维”指导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将“民主化”作为达成改革目标的决定性手段。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他要求实行“一般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并照搬西方的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多党制、总统制和三权分立，为反苏反共势力夺取政权提供途径。第二，将“公开化”作为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关键一环。“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现代社会主义。”^④然而，他所要“公开化”的对象都是苏共的失误和苏联历史的“黑料”，这些“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的全面揭露，作为意识形态操纵的一种手段，只能将苏联人民的认识引向否定苏共、苏联政府、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方向。第三，将“多元化”作为改革的重要一步。他大力倡导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要求言论多样化，主张政治、利益与意见的多元化，攻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是搞“精神垄断”，进一步扰乱了苏联民众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苏共的思想舆论阵地全面沦陷。

随后，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系统阐释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不仅改变了苏共的指导思想，也使其性质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为颠覆其领导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一，无视苏联高度集权体制形成的特定历史原因及起到的积极作用，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主张对其进行“根本改造”；第二，否定马克思主义，主张“彻底革新”苏共，改变苏共“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否定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定义苏共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第三，改革政治体制，引进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鼓励公民自己组织政党，主张苏共通过选举参与国家管理；第四，将苏联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归咎为公有制，极力鼓吹“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第五，否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有意淡化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这一理论不仅加剧了苏联经济的恶化，更激化了苏联的社会矛盾，使苏共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并进一步削弱了苏联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为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夺取政权创造了机会，也使苏联民众加速解除思想武装，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了解与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积极地迎合着西方的“和平演变”。

（二）迅速壮大的意识形态操纵集团，助推了苏联内部的分裂

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自己的错误理论、达成“改革”的政治目的，通过打压国内的反对者，提拔、任用亲西方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民主”人士，迅速组织起反共反苏的利益集团，对苏联内部展开了积极的破坏。

1. 打击“保守派”党员，解散、取缔党组织，逐渐摧毁苏共的组织力量。戈尔巴乔夫评判干部去留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支持他的“改革”路线，很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党员被打上了“保守派”的标签，并被迅速驱逐出政治权力中心。到1986年2月，就有140多名领导干部因不符合支持“改革”的“标准”被撤换；1988年，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在内的5位老资格领导人被裁撤；1989年4月，有100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被要求集体辞职。^⑤到1990年，苏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边疆区、州、直辖市的书记，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撤换。^⑥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组织系统也进行了积极的破坏。他认为，从组织结构上，用“群众性”的非正式组织瓦解苏共的群众基础，取消苏共的执

^① 李慎明、张树华 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栗瑞雪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 [俄]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③④}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第95页。

^⑤ 汤德森、赵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的严重偏差及深刻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第87页

^⑥ 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政党地位,是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关键。到1990年,苏联国内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①加之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苏共出现了退党狂潮,1991年7月苏共退党人数达到420万^②,约占党员总数的22%,这进一步摧毁了苏共的组织基础,苏共的支持率也降到了14%,其基本丧失了领导国家的能力。

2.重用亲西方的激进“民主派”,组建符合西方利益的意识形态操纵集团。戈尔巴乔夫无视党内组织原则,利用职权从上到下地对苏共进行改革,大量安插支持其“改革”路线的人员,以实施对苏联民众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识形态操纵。1986年,戈尔巴乔夫安排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全面掌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使苏联的思想舆论阵地很快变成了反共反苏的前哨阵地。同年,邀请萨哈罗夫回国,允许其与美国方面频繁接触,鼓励其参与政治活动,并按他的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在1989年帮助其成为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还将谢瓦尔德纳泽、麦德维杰夫等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充分发挥其否定苏共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由此,戈尔巴乔夫主导的,以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操纵集团被逐步构建起来。与此同时,数以万计具有政党萌芽性质的“非正式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口号的推动下得以建立,之后逐渐发展为真正的政党。“1991年2月,苏联便出现全国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③反对派组织践行了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操纵集团的意志,经常性地开展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致使苏联内部分裂状况不断加剧。

(三) 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加速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崩塌

戈尔巴乔夫利益集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不仅不设防,反而采取积极主动迎合的态度,并鼓励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致使原本被长期压抑的知识分子能够自由批评体制,苏联社会出现了各种拥护资本主义的声音,使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逐渐走向崩塌。

1.放任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鼓励民众接受西方价值观。1985年,戈尔巴乔夫鼓吹苏联人与西方的直接接触,“不用害怕,让他们彼此来来去去吧……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④同时,在多元化思想的指导下,他利用行政权力,要求从1988年12月开始停止对多家西方电台的技术干扰,不再对危害苏共政权的信息进行阻拦,还决定用专项外汇资金进口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⑤戈尔巴乔夫还通过制定法律,保障“多元化”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推行。1990年6月12日,他批准了《新闻出版法》,宣布“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实现“新闻自由”;7月15日,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宣布国家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⑥通过这一系列“开放”策略的实施,苏联社会逐渐形成了抛弃社会主义、跨入资本主义的广泛共识。

2.打着“公开性”与“多元化”的旗号,全面虚无苏共、苏联历史。在新闻舆论领域,雅科夫列夫先后安排一批自由派人士担任苏联最有影响力报刊的主编,利用主张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控制报刊、出版社、广播电视等媒体,“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⑦,在舆论操纵中使苏联社会朝着极端情绪化方向发展。在文化领域,宣传部门取消审查制度,允许出版过去的禁书,播放过去的禁片。在历史领域,史学界主张对苏共“历史的阴暗面”进行全面揭露,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的恶浪席卷全国,苏共党史被重新改写。在教育领域,教育部门销毁全部历史教材,在错误史观指导下重新编写、出版了苏联历史教科书《我们的祖国》,以致于给苏联民众造成了“过去的历史都是谎言”的错觉。在法律领域,立法部门贯彻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原则,制定了《苏联报刊

①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②孙铭:《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红旗文稿》2014年第11期,第36页。

③李慎明等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8页。

④[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⑤⑥王政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第307页。

⑦[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等专项法律法规，保障了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致使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暴增，严重挤压苏共掌握的报刊的生存空间。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舆论自由”还是双重标准，他对支持“改革”的言论大力支持，却对“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大肆批判，以此来打压维护苏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最为典型的是批判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通过戈尔巴乔夫及其利益集团的“不懈努力”，苏联内部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泛滥成灾，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被腐蚀殆尽，在西方国家的欢呼中轰然倒塌。

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纵苏联意识形态的深刻历史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来自西方的直接意识形态操纵和苏联内部“第二操纵者”的主动配合，共同促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灾难。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与挑战，增强防范意识形态操纵的意识，自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一）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指导思想作为一个政党创建的前提，是其开展实践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纯洁、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障，是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保障国家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②，是最具感召力、动员力和凝聚力的精神旗帜，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牢记初心与使命，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政治上的团结，才能领导人民打赢西方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只能像苏联一样葬送社会主义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是根据变化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要将其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群众的价值追求与崇高信仰。我们要深入、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繁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注重“显性”与“隐性”工作相结合，“正面宣传”与勇于批判错误观点相结合，在策略上既讲“灌输”、又讲“引导”、更讲“沟通”，在构建中国话语和加强对外传播中扩大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价值的国际影响力。

（二）加强舆论阵地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操纵，一直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操纵所依赖的媒介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转向互联网，并恶意解读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污名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西方利用自身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先发优势，以及在国际新闻传播上的话语霸权，通过网络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推行着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同时，伴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算法+推荐”、数字感知等技术使人们更容易陷入

^{①②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3页，第16页，第16页。

“个性化订制”所营造的“信息茧房”中无法自拔，在市场逐利、流量为王的背景下，一些媒体人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拥簇者、代言人。这更助长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强度，加大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树立强烈的舆论阵地意识，将新闻舆论阵地作为建设重点，深入推进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强和巩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民众价值认同的主流，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操纵。

第一，要通过建设网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宣传、研究平台，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网络主阵地；第二，要发挥党员干部在网络空间的积极作用，发掘与培育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人才；第三，要加大网络技术研发投入，防范网络技术风险；第四，要注重走网络群众路线，团结爱党、爱国的网络意见领袖、普通群众，激发爱国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壮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队伍；第五，要完善网络法制建设，为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体系；第六，要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的研判、监管、教育和疏导，促进舆论与主旋律的统一，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三）坚定全体党员的信仰信念信心

“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 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引领作用，他们的政治态度、行为作风直接影响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态度，他们的理论视野、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苏联党员干部从上到下大规模地腐化变质，以及对苏联解体、改旗易帜的坦然接受，与其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丧失社会主义信念和缺乏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密切相关。面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操纵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路线，苏共党员必然表现出匮乏的防范意识和孱弱的抵御能力，难以应对政治领域的复杂状况，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集体堕落与投降。所以，“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②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使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造就一支信仰坚定、思想纯洁、业务能力强的党员干部队伍。

第一，常态化制度化的理想信念教育是筑牢党员干部信仰信念信心的前提。增强党员干部的信仰信念信心，就需要以常态化组织机构设置为支撑，以完善考核评价奖惩机制为抓手，发挥好领导班子带头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党员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最新理论成果，不断提升理论素养。第二，在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实践中，内化理论学习成果。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必然应用于实践。只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扬实干精神、创造精神，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自信心。第三，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随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和各项意识形态治理措施的落实，西方也在变换意识形态渗透与操纵的手法，以使资产阶级价值观更具有迷惑性和吸引力。在意识形态状况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时代，党员干部只有具备强大的分析判断力、价值引领力、理论说服力等意识形态能力，才能更好地辨别各种言论、观点、思潮的本质，增强斗争本领，筑牢理想信念，引领社会发展。

（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政育人格局

青年是社会主义的未来，青年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蓬勃发展。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西方敌对势力一直视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一代为意识形态操纵的重点。因此，要破除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就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国家战略来抓，下大力气做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铸魂育人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促成员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格局，缔造千千万万信仰和拥护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一，要在加强专职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各学科教师的德育功能。学校专职思政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课教师队伍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巩固学校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这支队伍既要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用，传播好理论、思想和真理，也要以身作则、注重身教，谨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与态度，要用实际行动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要打破专业课教师仅教授专业知识的狭隘观念，明确自身肩负的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找准、梳理、提炼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将专业知识、能力传授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有机结合，促成综合育人的良好局面。第二，做好大中小学各学段的贯通、衔接与递进，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同与信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必须发挥好各学段塑造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要根据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身心特点、成长需要、生活环境等因素，开展适合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学生的启蒙性、常识性、理论性学习，通过体制机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一体化建设，循序渐进地建构起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三，课堂教学主渠道与实践教学主阵地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避免单纯理论学习的抽象与空洞问题，避免单纯实践教学的理论与思想支撑不足问题。因此，要提升课堂教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实效性，同时发挥好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主题教育等实践活动对深化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认同的作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The Historical Causes and Profound Lesson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WU Xue-le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bourgeoisie's habitual strategy of consolidating their rule is to use ideological means to control their thoughts internally and subvert their political power externally. In the last century, with the maturity of the theory of bourgeois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creasing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nti communist forces, the replacement of discourse systems, the input of erroneous information, and the instigation of elite levels, Soviet social values were continuously differentiated, creating and exacerbating the confusion of faith among the Soviet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the "second manipulator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 to construct erroneous theories, strengthen reactionary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historical nihilism further deconstructe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ccelerated its disintegration. Maintain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a crucial part of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We must firmly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Marxism's guiding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platforms, strengthen the belief and confidence of the entire party,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all-r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tern for all employees.

Key word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reas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常伟]